

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

XIANDAI
WENMING
DE
QIYUAN
YU
YANJING

钱乘旦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科研重点项目
“社会形态过渡问题研究”之二

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

钱乘旦 主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南京

(苏)新登字第011号

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

主 编 钱乘旦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丹徒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36千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305-01150-9/K·89

定价：6.60元

本 卷 作 者

(按各章先后顺序排列)

钱乘旦	杨 豫	刘 为	沈 汉
陈晓律	马 缨	颜世安	张益民
刘作启	王新生	高 华	

前 言

社会形态过渡问题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办公室提供资助。

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要求，本书侧重研究四个方面的史实与理论问题：（1）世界不同地区原始社会瓦解即阶级社会形成的历史过程、原因及特点；（2）欧洲主要国家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的历史过程、原因及特点；（3）第三世界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方式及其特点；（4）百年来中外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学说的研究概况及评述。中国处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上述研究不但有助于思想的解放、理论的繁荣、史学的发展，亦可为深化改革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养料。

本书分上、下两卷。

上卷《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研究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变过程，即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一次大转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打破历史研究的孤立主义，注意学科交叉，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乃至哲学与政治学诸领域最新成果，力求在史、论两个方面均有所创新。

对我们课题组来说，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首先要“明经”。重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原著，重在得其精髓、悟其精义，用来指导我们的研究，才能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摆脱教条主义影响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纠缠。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阶段论是行之有效的基本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

但帮助我们掌握对不同社会形态作定性分析、时态切割并寻找彼此间相互联系的技巧，还能从宏观上以其特有的逻辑方式反映历史的通性，从而培养了对未来的信念这种精神财富。坚持历史发展阶段论并不等于排斥历史道路的多样性，否则就会将逻辑研究方式变为对马克思的反命题。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其次是务实。“史所贵者，义也。史所据者，实也。”恩格斯提倡唯实不唯书，要我们尊重客观事实，不要超越史料无中生有，也不要盲目罗列事实而忽略对规律的追求。进一步掌握史料、挖掘史料、消化史料，才能实现史与论的有机结合。成功的结合才能产生新鲜成果。

母系制原始社会质的规定性在于这是一种以生物·社会关系制衡简单人际关系的稳定型社会机制。在此情况下，女性本位的群体共享主义（包括性的共享）成为最高社会信条。

从母系制到父权制是第一次历史性社会大转型。父权制部落阶级社会质的规定性在于，这是一种以社会·生物关系制衡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躁动型社会机制。在此情况下，男性中心的家族主义及分配与交换方面的个人主义开始取代先前的分享主义。

就雅典情况说，第二次社会大转型是从部落阶级社会到部落国家（从提修斯到梭伦），然后过渡到地域国家（第三次转型）。

从部落阶级社会走向奴隶制国家的雅典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历史的走向因时因地而异。有的从部落阶级制走向村社制，有的走向最终孕育了市民社会的封建制。作为史著，本书如实反映历史发展的丰富多样性。

“过渡”可按传统方式理解为演进，亦可因地制宜理解为变迁。经济基础决定论、人民群众决定论、阶级斗争决定论要求人们在诸多原因中找出一种主要原因，这无疑是一种科学分析方法。此外我们也注意到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合力论。地理环境、婚姻家

庭制度、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往往汇成一股合力，推动机制转换和社会转型。

下卷《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将论述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转折。这个转折不仅意味着生产力进步、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发生飞跃，还意味着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全面过渡，出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的全方位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集合在一起，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本卷将叙述这一变化过程，向读者展现与工业化（甚至先于工业化）同时出现的各种社会变化。与此同时，将着重探讨过渡中的转换机制，寻找哪些因素在过渡中起了作用，哪些阻碍它，它们又是如何分别起作用的。作者将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吸收不同学科的最新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述过渡中的某一方面，内容分别涉及利益集团的协调、经济结构的模式、文化观念的转换以及大众心理变化、社会价值构造、政治发展道路、社会结构转换等等过去鲜为人们所重视的方面。

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种形式，也是最早的形式，现代文明就是由此而发生的；但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并非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后发展国家因受内在因素和外来压力的影响制约，其转变过程会呈现多样性。因此本卷在着重研究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同时，也试图对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转换模式进行比较，以帮助读者对这种全球性变化作更广泛的了解。本卷将近代历史上的社会形态过渡与全球性现代化过程联系起来，从而把社会形态的转换放到更广阔的范围内加以研究，因此也就更具现实性。

如果说这本书还算新颖，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改革、开放的优良环境。

这一套由上下两卷组成的专著以大专院校的文科师生、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宣传以及政策研究部门的同志为读者对象，不仅可以培养历史兴趣，也有利于提高人们对理论的热情。

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负责

人孙伯铤教授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从申请基金到确定编写原则，他都给以热情关心和帮助。南京大学出版社时惠荣同志和陈载璋同志出席我们第一次课题研讨会时就明确表示支持出版这套书。在研讨编写方案过程中，陈得芝教授、洪家义教授、包忠文教授以及秦浩、蒋广学、朱剑、方延明等同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历史系的党政领导自始至终给以关心和支持。来自各个方面的热情关怀为我们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切实保证，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各卷撰稿人以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教师为主体，他们大都是中青年。此外还约请了少量外校作者，他们分别来自苏州大学历史系、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浙江大学哲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等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

上卷主编张树栋、刘广明，下卷主编钱乘旦，分别负责各卷的统稿工作。全卷的每篇文章均为专题研究。内容相类者编为一部分，若干部分构成全书。

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疏漏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尚望前辈学者和同行专家评点赐教。

张树栋

1991年1月30日

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

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

一代 序一

资本主义最初发生在14、15世纪的西欧，在此之前，人类文明已经历了长期而缓慢的发展过程。

文明的形成犹如点燃一支蜡烛，烛光所及，照亮周围的一小片。烛光不断扩散，离烛光越远，文明也就越消散，最后又湮没于黑暗之中。一支蜡烛很容易熄灭，早期人类历史上大概出现过不少一支烛的文明曦微，但多数都没有能留传下来，或者没有能发展下去，而是停留在它们发生时的初始阶段上。

但如果有许多蜡烛不断点燃，情况就不同了。烛光接二连三地点亮，就连成一片光明。这时，光亮不是发自一个光源，而是出自许多光源，它们间彼此交融，把彼此的光揉合在一起，此生彼灭，越传越远。这样形成的文明兼含了许多文明发源地的特色，兼容并取，相得益彰，生命力强，就延续下来了。

文明的扩散与融合就是这样进行的。大约在7000年前，尼罗河流域率先点燃文明之光，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也相继出现远古文明，这些就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起初，这些文明波及的范围都很小，随后逐渐扩大，开始了文明扩散的过

程。某种较高级度的文化从一个中心向四周扩散，使周围较低发展水平的文化受其影响而融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地区性的文化。当地区性的文化固定下来并继续向外扩散时，它可能碰到两种情况：如果它周围没有比较发展的人类文化，那么它就像一支蜡烛，很容易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熄灭；如果它的扩散遇到了其他发展的文化，那么这些文化就会互相交融，并且在交融中继续发展。古代地中海地区及西亚地区显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地中海周边出现了许多文明中心，彼此相互影响；西亚地区，从地中海东岸到伊朗高原，也接连出现远古文明，都曾经有相当高度的文化成就。此外，在东亚，中国古代关于黄帝、炎帝以及其他许多远古帝王的传说以及夏商周的相继出现，似乎也说明了这种情况。总之，大凡在文明延续并扩展起来的地区，往往都不只一个文化中心。许多地区性的文化通过接触交流（包括文化交流及战争等等）融汇出共同的特征，最终形成一种“模式”，这时候，文化圈的雏型就形成了。在同一个文化圈内，“模式”主宰着地区文化，使这些文化多少相似。“模式”的核心是“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同一类型的文化必须具有大体相同的价值体系，由此而构成一个文化圈。

但“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它只有借助于有形的载体才能固定下来，并向外扩散。这些有形的载体就是社会建制，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是国家与宗教（意识形态）。文化主要就是借助于国家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力量而凝固并向外扩散的，这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一个社会的凝聚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凝聚，而成功的社会扩散归根到底也必须是文化的扩散。

在资本主义发生前的几千年中，人类文明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文明产生到地区性文化扩散再形成文化圈的过程。到资本主义发生时，全世界已形成四个文化圈，从东到西排列，它们是“中国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欧

洲文化圈”（也可称“基督教文化圈”）。除这四大文化圈之外，应该说还有一个准文化圈正在形成中，但还没有完全成形，特别是还没有出现作为价值的高度体现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我这里指的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文化，这些文化是在完全隔绝于世界其他地区之外的状态下发展的，但它们已经形成地区性文化了，而且有继续扩散的趋势。

国家与宗教既是文化的载体，用它来观察四大文化圈，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现象：在古代地中海沿岸及两河流域，国家的出现虽然很早（公元前4000年中期在埃及出现，公元前3000年前后在两河流域出现），但统一的意识形态却形成得很晚，因此文化圈的定型也就相对较晚。古代希腊世界和罗马帝国都曾一度幅员广大，但它们都只是在军事力量强制下形成的政治集合体，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也就没有出现统一的文化模式。换句话说，这些政治集合体不是靠文化的扩散，而是靠强力形成的。在这个阶段上，地中海沿岸和西亚地区都只完成了地区性文化形成的过程，在希腊世界和罗马帝国内部，实际上都存在着许多差异很大的地区性文化，比如犹太文化和意大利半岛上的希腊—罗马文化就迥然有异。因此，这些政治实体很容易崩溃，崩溃之后便荡然无存，再也不可能恢复起来。地中海地区出现能够使地区性文化融合起来的统一的宗教，是在罗马帝国后期，当时罗马皇帝接受了基督教，使它成为国教。从此以后，基督教文化就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世界（但不是罗马世界）的文化模式，基督教价值也成了欧洲文化圈的共同价值体系。更晚一些时候，伊斯兰教出现之后（公元7世纪），另一个文化圈才最终形成，这个文化圈囊括了欧亚非三洲交界处绝大多数的文化发源地，包括埃及和两河流域，但它是多种地区性文化的融合。到伊斯兰文化圈形成之后，地中海—西亚地区文化融合的过程才算完成。从此之后，有两个泾渭分明的文化圈彼此对峙，自远古时期就开始的多种文明

冲突交融、争雄不下的局面终告结束。

与地中海—西亚地区不同，在东亚及南亚的文明发源地，国家的出现虽然较晚（中国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印度则更迟）但统一的价值观念却形成得相当早，因此文化圈也较早定型。古印度文明的价值观念核心是种姓制度，婆罗门教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价值观。婆罗门教的出现，标志着印度文化圈的核心基本形成，以种族制度为特征的共同意识形态成为维系印度社会的主要文化纽带。尼赫鲁曾以赞许的口气说：“在印度人们保持着种姓制的条件之下，印度终归是印度；但是从他们与这个制度脱离关系的那一天起，印度就不复存在了。”^①婆罗门教的主要价值观念后来融合到印度教中，它的正统地位也由印度教取而代之。佛教曾企图打破种姓制度，但最后则必须与之相妥协。

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以宗法关系为出发点的家族主义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并成为中国文化圈的显著特色。^②这种价值体系形成于西周，孔子的学说是这种价值体系的集大成者。儒学在中国文化圈中相当于其他文化圈中统一的宗教的地位，起着使文化特征凝固下来的有形载体的作用，并且承担文化扩散的功能。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几千年来经久不息，就因为这种价值体系相当坚固。儒学不仅是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而且

①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15页。

② 范文澜说：“宗法与土地的分配法关系如此密切，因而不论是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祖宗崇拜在意识形态里占唯一重要的位置……这是历史上汉族民族特征之一。”（《中国历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8—39页）。余英时说：“在（中国）各层社会集合之中，‘家’无疑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环，‘国’与‘天下’也都是以‘家’为范本的。所以有‘国家’、‘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弟兄之类的观念……”（《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可见，学术界虽有不同观点，但在家族主义问题上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

还在中国周边民族与国家中传播与发展，中国文化圈确实是借助儒学的传播而形成起来的。

总之，在世界几千年历史中，东方两个文化圈先于西方两个文化圈形成。

不管怎样，到资本主义发生时，世界的格局基本上是：经过长期的凝固与扩散，四大文化圈都已扩张到各自的极限，由于受地理障碍的限制而不能再扩展了。基督教文化已经弥散到整个欧洲，它唯一可以继续扩展的出口在东部，但那里是西伯利亚无人的寒冷大森林。伊斯兰文化已渗入北非沙漠，再往南，是难以穿行的热带丛林，在那里文明似乎还未觉醒。印度次大陆三面环海，北面则被喜马拉雅山拦住了去路。中国文化圈东面抵达大海，北面已到荒漠，西面进入戈壁，南面正对丛林——里面是中国人自古就害怕的“瘴气”。在每两个文化圈之间，还有一些文化的过渡区或缓冲区，比如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是东南亚（印度支那），在中国与伊斯兰之间是中亚沙漠，在伊斯兰与欧洲之间是东南欧；过渡区中两种文化的影响都有。除了四大文化圈所覆盖的这些地区以及中南美的准文化圈之外，文明在世界其他地方就只有星星点点的火花了。它们分得很散，全然不成体系。世界上有一些文明遗址至今仍得不到充分的解释，也许它们是一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但由于太孤单了，因此而得不到充分发展和扩散。它们大概就是前面所说的“一支烛”的文明。^①

① 比如现在津巴布韦丛林中有古代“石头城”（音即“津巴布韦”）的遗址，这就是一种古老文化的有力证据。这种文化隔离于其他文明中心，长期独立地发展，但后来却未能发展下去，“石头城”也埋没在荒草密林之中了，到1868年才重新被发现。这类神秘的文明遗址在南部非洲还有多处，巴兹尔·戴维逊曾说：“漫长的（非洲）东海岸以内的大陆，在文化上并没有，也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09页。）这大概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非洲腹地，文明曾经发生，却没有能扩散并延续下来的原因。类似的情况在太平洋岛屿及南美洲也有。

由于当时人类的技术水平，各文化圈要克服面临的地理障碍，继续扩散是很难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历史地位所作的解释。他们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的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造就了一个世界性文明。

资本主义创造了强大的生产力，它所召唤的科学技术发展打破了各文化圈间天然疆界的限制，而把人类带入一个共同文明——现代文明中来了。然而，现代文明并不是哪一种文化的自动延续，而是各文化圈交融的过程。现代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世界性，它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成就。布莱克说：近代较先进的国家对较落后的国家确实有很大影响，但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因为“它不仅未能考虑到先进国家本身最初的转变，而且也未考虑到较落后的国家对更落后的国家的影响”^②。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有一个改造自己的传统使之进入现代文明的过程，再先进的国家也都经历过并仍在经历“现代化”。我们在谈论“现代文明”的时候，首先必须明确这一点。

但现代文明一开始是在欧洲萌发的，当它最早出现时，它以资本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上文所引用《共产党宣言》那段话中所表达的意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②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C·E·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纽约，1967，第6页。

欧洲为什么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显然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我们仍可以把欧洲在资本主义发生前的社会状态作一简单的回顾，并将它与其他文化圈进行比较，这样，也许就可以对这个问题看出一点端倪来。

欧洲文化模式起源于古代希腊社会，这一点是世界上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汤因比说：“我们西方社会和古希腊社会的关系……，好像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一样。”^①战后美国一本流传很广的大学教科书在谈到希腊文化时也这样说：“在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其文化最能体现西方人精神的是古希腊人。”^②的确，古希腊社会以个人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和商业精神以及其他种种特征不仅留传给罗马，使古代罗马文化具有典型的西方文化的特征，而且影响到后来欧洲整个的历史发展，至今欧洲（特别是西欧）的许多文化现象都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社会。

但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欧洲文化圈”成形并固定下来却应该从基督教传播算起。基督教扮演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的角色，同时也担任欧洲文化扩散的工具。接受基督教意味着野蛮人皈依文明，同时也意味着对超国界的欧洲文化的认同。由于基督教的传播，日耳曼人消灭了西罗马帝国却归顺了罗马天主教会，斯拉夫人威胁着拜占庭却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欧洲文明从地中海扩散到整个欧洲。到资本主义发生时，欧洲是一个基督教的大世界。但这个世界一分两半，最早的资本主义是在天主教的西部地区发生的，因此我们对这个地区就应当特别关注，找出它的特殊之处。

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即它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既是一种经济结构，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①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② 伯恩斯：《西方文明》(Edward • M. Burns, Western Civilizations)，第8版，纽约，1973，第1卷，第113页。

封建主义在欧洲有严格的含义，但这个词后来被广义化了，用来泛指世界许多地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西欧，以及在很大意义上的整个欧洲，封建主义与领地分封制联系在一起，“土地不再作为私人财产分出去，而是由国王分配给他的封臣，以换取军役义务。封臣们在自己的地产上征集受过训练的人，带领他们去打仗。”^①土地的占有与军役义务相关联，而且可以一级一级地分下去，由大封建主封给小一点的封建主，最后及至农民，这就是封建主义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内容。

土地分封制造成相应的社会等级结构，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在金字塔的顶端坐着世袭的君主，其下是一层一层的封建主，农奴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他们是社会的基础。封建化的程度越高，“无主的”自由农民就越少。“人各有其主”，这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但这个金字塔并不是浑然一个整体，它只在相邻两个层次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在典型的封建社会中，高一层的封建主只对他的直接受封人发号施令，因为他的土地是封给这些受封人的。反过来说，低一层的封建主也只对他的直接封主有服从义务，因为他从直接封主手中得到了土地。这意味着国王并不一定能号令所有的贵族，大贵族也不见得能号令全体小贵族，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一定是我的附庸”。

这种情况造成两个后果，其一是封主与封臣用契约的形式固定其相互关系，彼此都有权利，彼此也都有义务。“小领主成为大领主的‘封臣’，置自己于大领主的保护之下并同意效劳，其性质往往是军事的；大领主则同意保护其封臣的土地作为回报”，“并答应对其封臣‘主持公道’”。^②任何一方不履行义

① 祖勃里茨基等：《前资本主义社会简史》（Y·Zubritsky, V·Kerov & D·Mitropolsky: A Short History of Pre-Capitalist Society），莫斯科，第95页。

② 海斯和克拉克：《中世纪和近代早期》（Carlton J·H·Hayes & Frederick F·Clack,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imes）纽约，1966，第91、92页。

务便违反了封建契约，因而封建秩序也就遭到破坏。

其二是权力极为分散，每一个领主都行使完全的司法、行政权，每一个庄园都是一个独立的司法、行政单位。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因为它不符合“国家主权”的原则。但在西欧封建社会，它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当时交通很落后，各地区几乎完全处于封闭的状态中，彼此间很少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权力集中而不能行使，倒不如分散权力，实行比较有效的治理。

权力如此分散自然也受制于生产发展的状况。在当时西欧，每一个庄园就是一个经济独立体，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各地在经济上既然没有多少联系，在政治上自成一统当然也就有可能。

自给自足的经济、分散的权力、松散的社会联系，这些就是中世纪欧洲的特色。这些特色使欧洲文明在1000年中发展迟缓，失去了古希腊罗马的光辉。举一个例子：欧洲古代发达的医药学在中世纪失传了，相反却在阿拉伯人的药典里保存下来。与其他几大文明相比，欧洲（特别是西欧）明显地落在后面，西方有些学者把这一千年称作是“黑暗的中世纪”，显然有一种痛心疾首之感。

但资本主义最终在欧洲（严格地说是在西欧）萌发，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异己的力量——商业和城市。

西欧的商业和城市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历史现象。就连欧洲东部也不具备西欧的这种特殊性。说西欧特殊，并不是说它的城市特别繁华，商业特别发达。相反，无论与古代的希腊、罗马相比，还是与同期的东方世界相比，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与商业都相当凋蔽，十分冷落，即便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诺亚，也大不如中国的诸如泉州和扬州。无怪乎一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要感叹东方城市的繁华富庶。而马可·波罗回国后写的游记，刺激起西方人到东方寻宝的热望，正是这种热望，导致了后来地理大发现，以及由地理大发现引起的世界面貌的改变。